

上海青年学者呼吁 重建人文精神

《读书》三月号以头条位置刊发了上海四位青年学者的讨论，反思中国人文学科陷入根本危机的原因，并探寻重建人文精神的可能性。

这场“人文精神寻思录”的讨论是由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等发起的。在第一篇“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讨论中，这四位学者分析了哲学、文学批评等学术领域的现状，指出目前中国人文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正在枯竭，在哲学上“几乎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怀疑和批判”，失去了必要的终极关怀，文学批评界缺乏生气，“批评家丧失了对批评的根本意义的确信”；就整个个人文学术界而言，“一直提不出真正的问题，似乎连问题都需要从外面输入”，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问题在大陆，提问在海外，现象在大陆，解释在海外。由此，他们认为：人文学术在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危机，甚至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没有人文精神，也是

“批评家丧失了对批评的根本意义的确信”；就整个个人文学术界而言，“一直提不出真正的问题，似乎连问题都需要从外面输入”，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问题在大陆，提问在海外，现象在大陆，解释在海外。由此，他们认为：人文学术在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危机，甚至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没有人文精神，也是

一个让人怀疑的问题。

四位学者继而进一步分析了人文精神失落的内在原因。他们指出，在封建社会，由孔子起逐步建立的儒家道统是封建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体现，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一个稳定悠久的精神传统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一旦学术成为一种技术性而不是人文性的研究活动时，必然会导致客观上的人格萎缩，表现为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学苏秦张仪去做政治工具，或者把学术看作是自我逃避的场所，这两条路都无法重建人文精神。

在这篇讨论中，他们还涉及人文精神的普遍原则、实践的个体性、对相对主义的质疑、价值规范等理论问题。他们认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一个探索过程，而他们想做的只是“打扫这条思路，让更多的问题能够浮现出来。”

据悉，京沪两地的众多青年学者将参加这一共同的“寻思”，他们将就“解构”思潮与人文精神追寻的关系，“国学”对人文精神重建的影响，人文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大众文化的高涨等多个方面的思考探寻来推动和深化这场讨论。

（3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

读书学习与文化消费

目前我国文化消费存在着明显偏颇。大多数居民只重娱乐消费，而忽略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方面的投资

文化消费是相对于物质消费而言的精神层次上的消费，它反映着社会和民族的精神风貌，影响并推动着人们的思想体系、价值标准、生活方式，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主要方面。

目前，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投资占生活总开支的27.39%，比1981年高18.96个百分点，比1985年高17.08个百分点。倘若仅看这一组数字，人们对文化消费的投资明显地是增加了，但如果稍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目前我国文化消费存在着明显的偏颇。这其中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大多数居民（特别是青年人）只看重娱乐消费，而忽略读书、学习等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方面的投资。据有关部门调查，80年代我国居民书报支出占文化消费的13.3%，而90年代初仅占8.6%，下降了4.8个百分点。

不久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广州、上海、黑龙江、辽宁、山东等6省市青少年研究所及广西团校联合举办了一次大调查，调查涉及全国9个省市4600多名城乡青年，结果表明，有近40%的年轻人除课本外基本无藏书，只有50册左右的达36%，藏书在500册以上的仅占2%。

现在，有些青年人上歌舞厅一次花几十元、上百元不在乎，而买书订报却抠抠缩缩，有的青年家里装饰豪华，家电齐全，却四壁没有“书气”。

目前，我国居民在穿着、日用品和家电方面的消费，无论质量还是普及率均接受或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但在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却仍是相当落后，差距甚远。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摘自2月19日《人民政协报》，鲁晨文）